

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陈翔

摘要：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关键词：安史之乱；仆固怀恩；唐代宗；河北藩镇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1-0070-05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分界线，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关于安史之乱是怎样结束的或者说唐朝政府是依靠什么力量、方式平定这场叛乱的问题。因为理解这一问题对于认识代宗对待安史叛将的政策、代宗朝政治以及河北藩镇割据的原因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是故古今中外学者对此做了很多的探索。吕思勉、岑仲勉、王仲荦等学者研究指出叛乱的平定是朝廷藉回纥之力所为；^①王寿南则以为叛军的内讧对于战争局势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叛军的内讧最终导致安史叛乱的结束；^②黄永年、林冠群、张国刚、吴宗国等人则认为叛乱是因朝廷与叛将的妥协而结束的或是因朝廷对旧将采取全面宽大的政策亦即援引旧例授予安史降将节度使之职所致。^③而另有不少学者认为叛乱的结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韩国磐、毛汉光先生就认为叛乱的平定是朝廷藉回纥之力并因朝廷接受贼降将之条件所致。^④而在王夫之、袁英光、石云涛等人看来，叛乱的平定是因朝廷在叛军自相残杀的情况下乘之敝藉回纥之力所致。^⑤只不过他们所说的多种因素无外乎吕思勉、王寿南、黄永年等先生各自的论点。总而言之，在诸多学者看来，安史叛乱的结束并非因朝廷军队本身之强大实力所致。前辈今贤对此所做的这些研究令后学受益匪浅，也使后学对此问题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我们重新翻阅了史籍，对该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并且对代宗对待安史叛将的政策、代宗朝政治甚至河北藩镇重建初期的政治状态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唐朝军队在安史叛乱平定中的作用

宝应元年（762），代宗嗣位，随后任命使臣及仆固怀恩往回纥处求取援兵。回纥可汗出动了4千兵马，与前几次出兵的数量约略相等。^⑥之后，代宗任命仆固怀恩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统领诸军行营出征。唐朝军队分道进逼洛阳，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鱼朝恩等为后殿自浉池入，李抱玉自河阳入，李光弼则自陈留入。^⑦官军到洛阳北郊时，就分兵攻取怀州。^⑧史书记载史朝义军队见到官军之整肃都露出了惧色。^⑨叛军先是以数万兵战败。史朝肃义继以10万铁骑来救，阵于昭觉寺。其时“贼皆殊死决战”，两军短兵既接，相杀甚众。”此似见当时叛军气势尚旺。这时，“官军骤击之，贼阵而不动。”就在这危急关头，镇西节度使马磷临危不惧、挺身而出，

* 本文的撰写在资料上得到了台湾中正大学林冠群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顾乃武博士的襄助，在此谨表谢忱。

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唐朝大军随即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万二千人。”^⑩在两军交战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正是马璘的果断和胆识，使战役的胜利天平完全倾向了官军。昭觉寺一战极大地鼓舞了官军的士气，也重创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以致在随后的石榴园、老君庙战役，叛军屡屡丧败。^⑪在这一关键战役中，未见回纥军队有何特殊的贡献。^⑫或许，通过这次战役，官军认识到了回纥军队的参战并非不可或缺。这也可能是其后仆固怀恩留回纥可汗守河阳的原因之一。

史朝义兵败洛阳后往东逃跑，怀恩留回纥可汗守河阳的同时，命其子仆固瑒领兵继续追击史朝义。为什么怀恩要留回纥可汗守河阳？黄永年先生指出，因为回纥在中原的烧掠已让中原百姓受不了，河北的百姓并不见得那么好欺负。如果让回纥也往河北，河北军民一起殊死抵抗，事情就糟了。九节度兵败相州之时，回纥三千骑之损失就是先例。^⑬我们不能首肯这种意见。按照这种说法，是朝廷无意让回纥军队往河北作战。代宗派遣药子昂说回纥出兵时，子昂曾经提出了三种援助方案，第一种是自土门略邢、洛、卫、怀而南。^⑭子昂出使回纥乃朝廷所命，若无朝廷首肯，其断然不会向回纥述此想法。观子昂所提的第一种方案，就是让回纥直捣河北，依此可以说战前朝廷本是有意让回纥追逐河北的。回纥最后同意的是药子昂提出的第三种方案即“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⑮胡三省注：“史言回纥所利在中国财宝，而不敢轻与贼遇。”^⑯由此可见，回纥是不大愿意与叛军正面交锋的。因为他们害怕再有损失。前此相州之战就白白损失了3千兵马。^⑰此次又是前往河北作战，很难保证不会再有损失。持“所利在中国财宝，而不敢轻与贼遇”的心态再加上前车之鉴，我们认为倒是回纥不肯去河北。既然回纥留守于河阳，其就无兵马参与河北战役了。^⑱

史朝义东逃后，仆固瑒乘胜追击，不给顽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仆固瑒是以大胜之军乘胜追击的，其势正盛。史朝义虽屡结兵马出战，然终无胜绩。在其同田承嗣联合抵抗官军败于魏州后，“贼徒震骇”。^⑲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⑳此见魏州之败

对于叛军的打击是巨大的，使之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相、恒等才被迫投降、受代。若唐朝军队的实力不如叛军强大，叛军岂肯投降、受代呢？《旧唐书·王武俊传》载：“宝应元年，王师入井陘，将平河朔，武俊谓宝臣曰：以寡敌众，以曲遇直，战则离，守则溃，锐师远斗，庸可御乎？宝臣遂彻警备，以恒、定、深、赵、易五州归国……”^㉑魏州一战后，史朝义又屡次联合田承嗣拒战，亦不免数败。最后田承嗣劝史朝义往幽州援请救兵。田承嗣在史朝义走后就领兵投降了。此前李怀仙也已经投降了。史朝义不久即死于幽州境内，河北悉平，安史之乱结束。关于田承嗣的投降，《新唐书·藩镇魏博》有这样一段记载：“仆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诈朝义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执贼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间瑒将士。瑒虑下生变，即约降。承嗣诈疾不出，瑒欲驰入取之，承嗣列千刀为备，瑒不得志，承嗣重赂之以免。”^㉒有学者据此认为当时唐朝政府即欲便宜更易安史叛将，也颇为不易。因为在其看来，回纥兵力参战的仅数千而已，而朝廷非藉之不能讨，就说明唐朝军队本身不行。^㉓或据此认为田承嗣拥有兵力，仆固瑒对之无可奈何，其它降将亦复如此。^㉔我们以为此举只能说明田承嗣阴险、狡诈而已，并不能说明其实力强大。观仆固瑒逐北之时，田承嗣急急劝史朝义往北求救于李怀仙，足见唐朝军队实力之强；而田承嗣实弱，不然其何以急急劝史朝义往北求救于李怀仙？^㉕观其“诈疾不出”似见其在实力不济时善耍小阴谋。大历十年（773），田承嗣为唐朝军队讨伐而几乎溃败之际，就是耍此类小阴谋才使李正己、李宝臣释之的。胡三省注：“史言田承嗣凶狡过于诸帅。”^㉖我们亦可从“田承嗣等人迎拜于仆固怀恩之马首乞行间自效”^㉗寻得证据。乞乃哀求之意，其若有抵抗之实力何致于此？一个“乞”字足以道尽当时双方实力的差距！

在交战之初，唐朝军队的数量确实与安史叛军有一定差距。我们以为军队征战能否取胜，兵力多寡固然重要，但恐非决定性因素。军队战斗力等因素应当更为重要。昭觉寺一战前，双方的气势不相上下。但是，昭觉寺一战改变了两军的士气。昭觉寺一战极大地鼓舞了官军的士气，也重创了叛军的嚣张气焰。士气的变化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影响是无形而巨大的。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唐朝军队与安史叛军在兵力数量、战斗力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唐军是愈战愈勇，

士气陡升；叛军几屡战屡败，士气、信心、战斗力急剧下降，以致有举数州之地投降唐军之事。战争尾声阶段，唐朝军队与安史叛军间的实力差距是极为明显的，唐朝军队无论是在兵力数量上还是在战斗力上皆远胜安史叛军。我们可对双方的兵力数量作一比较。唐朝军队出征时兵力达10余万，^③经过平乱，当有一定的损失，但是恐怕不会太多，姑不计其损失。李宝臣的恒州军原有3万兵马。^④恒州兵马当由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所统领，因李宝臣业已投降、受代。相卫的兵马按《薛嵩神道碑》的记载也有3万，^⑤但是恐有夸大之嫌。因为安史之乱平定后薛嵩训练所得的兵才3万，故薛嵩投降时兵力当不足3万，大约在2万左右。而相卫的兵马亦属唐军所领，因为薛嵩也已投降、受代。这样估算起来，唐朝军队的数量当在15万左右。而安史叛军的实力呢？仆固瑒是以万余兵追逐史朝义的，田承嗣劝史朝义往北求救于李怀仙的5万兵，而田承嗣的兵力亦当少于1万，因其认为仆固瑒强于己。^⑥依此来看，唐朝军队的兵力是安史叛军的近乎3倍之多，且战斗力远胜之，以此之师何得不能铲除河北余孽！^⑦通常认为唐朝仅倚任朔方军平定叛乱，因此才会有朝廷实力不足以平定叛乱之说。事实上，此次参与讨伐叛乱的军队不止朔方军，还包括河东军、泽潞军、李光弼的军队及神策军等等。《旧唐书·代宗本纪》载：“（宝应元年）冬十月辛酉，诏天下兵马元帅雍王统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兵十余万讨史朝义……”^⑧此次征讨又汲取了九节度兵败相州的教训。当时，朝廷为了压制朔方军功，命九节度直取相州；命河东的李光弼等一同由洛阳进兵直取相州，而不命其由井陘直捣河北，以成夹击之势，遂致相州之败。^⑨此次征讨则采取夹击之策略。代宗在大战史朝义军队之前曾向诸将询问了征讨史朝义的策略。当时长孙全绪认为由李抱玉捣河北、光弼自陈留入，断其手足，然后让大军横行其中，贼可败也。^⑩大军的行军路线与之略似，足以证明确实是实行了这一战略。唐朝军队能平定叛乱也与实行正确的军事作战策略有关。

二、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的重建

朝廷是有实力平定安史之乱、有能力彻底铲除河北之安史余孽。既然如此，唐朝政府何以还要将河北之地拱手授予安史叛将镇守，卒养成后来的藩镇割据之患呢？这一问题即是代宗对待叛

将的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关乎我们对代宗朝政治的理解。近代史家多将河北之地拱手授予安史叛将镇守的责任完全推诿于朝廷而否认仆固怀恩树党自固的。在他们看来，所谓仆固怀恩树党自固的记载系朝廷的诬词，将河北之地授予安史叛将镇守完全是朝廷的旨意。^⑪他们否认仆固怀恩树党自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是其所持之“叛乱的结束并非因朝廷实力强大所致”的主张。此外，他们还举了很多例证以支持他们的说法：其一，朝廷在平定安史之乱前所下诏敕称，但取史朝义其余一概不问，并加超赏，有封赏、安抚降将的意思。此前能元皓、张献诚等投降时，朝廷皆授予节度使之职，因此朝廷援引旧例以薛嵩等为节度使；其二，史书记载，朝廷上下均言其冤，仅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言其反；其三，仆固怀恩叛变后，并没有求援于河北，而河北也未曾援助之。他们提出的这些证据相当有力，而持仆固怀恩树党自固说者，仅仅只是转述旧史的记载，对上引证据并未作出任何响应；且其也主张叛乱的结束并非因朝廷实力强大所致，与否认仆固怀恩树党自固论者所据之前提相一致，以致否认仆固怀恩树党自固之论在学界一直占有主导地位。^⑫持否认仆固怀恩树党自固论者的理论前提，前此已反驳，兹不赘言。^⑬接下来，我们将在辩驳前辈今贤所提出的上述论据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提出个人的几点新认识。

朝廷在平定安史之乱前所下诏敕称，但取史朝义其余一概不问，并加超赏，有封赏、安抚降将的意思。此前能元皓、张献诚等投降时，朝廷皆授予节度使之职，因此朝廷援引旧例以薛嵩等为节度使。这似乎说明以薛嵩等为节度使是朝廷的意思。我们不能首肯这种看法。我们先以李忠臣、薛嵩受代之事为例。李忠臣、薛嵩之受代，是李抱玉、辛云京之令。李抱玉、辛云京令薛嵩、李忠臣受代，很可能是奉朝廷的旨意。二人皆忠心不贰之人，^⑭恐不会擅作主张令薛嵩等受代。由此似见朝廷原无意以安史叛将为节度使。我们再比较一下薛嵩与李宝臣被授予节度使之职的时间。两人几乎是同时归降朝廷的，但是在李宝臣官复原职的翌年，薛嵩才被任命为相卫节度使。^⑮薛嵩在投降后，李抱玉令其受代，不久怀恩即令复位。随后，抱玉等上书言怀恩有贰心，怀恩则上书自辩。代宗当即加以慰勉。但是，这种慰勉并未使薛嵩立即官复其职，此举似可说明朝廷本无意以安史叛将为节度使。

《旧唐书·仆固怀恩传》记载：“（颜真卿）

对曰：‘……且明怀恩反者，独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④事实上，言其反者还有马燧。《旧唐书·马燧传》：燧因说抱玉曰：‘属者与回纥言，燧得其情。今仆固怀恩恃功树党，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于怀恩，其子场佻勇不义。以燧度之，将必窥太原西山以为乱，公宜深备之。’”^⑤有学者以“燧度之”之语认为马燧猜测怀恩树党自固纯属臆测。^⑥我们以为马燧的话是有根据的，并非臆测。回纥与仆固怀恩的关系本不一般，而且二者又尝交通，故而“得其情”者必得窥知仆固怀恩一举一动的真实想法。那么何以见得回纥与仆固怀恩交通？《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纥使还，怀恩与可汗往来，恐泄其事，乃止之。”^⑦观怀恩叛变后，曾令薛嵩馈粮，^⑧并“分使河朔，连扇群帅，邀我（田承嗣）同恶，示以师期”，^⑨足以证明怀恩确有树党自固。

如此看来，怀恩确有树党自固，朝廷实无意令安史叛将分帅河北。那么，朝廷因何要同意仆固怀恩的奏请？《资治通鉴》卷222记载：‘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⑩我们以为所谓“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是指代宗皇帝担心若不同意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的请求，其就会勾结河北诸藩叛变，这样就不免再滋生战事，因而才不得不批准怀恩的奏请，令安史叛将分帅河北。通常的看法是指如果朝廷不答应叛将分帅河北的要求，叛军将会坚持抵抗到底，而忽略了朝廷担心仆固怀恩与安史叛将联合这层因素。

三、战后唐朝中央与河北的关系

尽管代宗同意安史叛将分帅河北，但是他对于仆固怀恩与安史叛将联合的可能性一直忧心忡忡。为了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战后代宗皇帝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他极力优待仆固怀恩。^⑪怎奈怀恩越走越远，直至叛变，以致代宗发出了“怀恩父子负朕实深”^⑫的感慨！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削弱、限制河北的实力，期消灭其实力于无形之中。我们查阅史籍，发现广德元年（763），河北四大藩镇的属地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是年五月，幽州节度的冀州

以及魏博的沧州、瀛州转隶淄青，^⑬魏博的贝州转隶洺相，^⑭相卫的卫州隶属泽潞。^⑮魏博、相卫分别割出沧、瀛、贝、卫四州的同时，也分别得到了德、贝二州。^⑯朝廷虽让出了德州，却得到了“皆尽形胜战略之地”的沧、瀛、冀、卫四州。^⑰沧州乃水陆辐聚之地，顾祖禹谓此地是“燕得之势足以弱齐，齐得之势足以威燕动赵矣。”^⑱时朝廷已据有青、冀二州，就可充分发挥沧州“连青、济之甲，走深、冀之道，河北诸州，皆将奔命焉”^⑲的战略功能，此足见朝廷得沧、冀两地对于河北威胁之所在。魏博虽得德州，其亦是形胜之地，“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⑳但是，朝廷获得有“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㉑美誉之瀛州，亦足以钳制有平原郡之别称的德州。沧、瀛、冀三州皆具有战略意义，朝廷得此三州，即是在河北腹心安置了一把利刃。而卫州“南滨大河，西控上党”，^㉒亦属要冲之地。控制了卫州实际上就控制了黄河渡口，使得河北无法轻易南下的同时，也使朝廷掌握了随时攻略河北的主动权。这种军事战略格局的初步形成体现出了一位皇帝所应有的魄力和谋略！同时，我们再联系大历晚期，泽潞取得具有战略意义的邢、洺、磁三州表明代宗晚期的藩镇政策正趋于强硬，^㉓似可见代宗嗣位之初中央强硬的藩镇政策。

虽然河北藩镇对于中央政府削减自己的属地无可奈何，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任何恢复实力的机会，他们也一直在等待时机。前此我们提及怀恩叛变后，曾令薛嵩馈粮，并派人往河朔，煽动河北诸藩起兵。^㉔但是他们没有响应。我们以为河北诸藩没有听从怀恩的响应，除了自身实力尚不足以抗衡中央外，可能还在于中央政府满足了河北诸藩的要求。土地本是河北所觊觎的。广德元年，朝廷着意削弱河北藩镇的实力，强制性地削减了他们的辖区，并欲消灭其实力于无形之中，这当然是河北诸藩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怀恩遣使煽动河北诸藩起兵之际，河北诸藩极有可能趁机向朝廷提出要挟，要求回归他们的土地。而在面临着西北吐蕃的节节进逼的同时，为阻止河北诸藩响应怀恩的叛变，以免两面受敌，朝廷极有可能作出让步，归还原先所割出的河北诸藩的土地，甚至适度地扩大其地盘。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在魏博的沧州、瀛州与幽州的冀州转隶淄青以及相卫的卫州隶属泽潞后的当年年底，沧、瀛两州就复归魏博，冀州也为成德所据，卫州则复隶相卫。^㉕精心策划的军事战略格局亦随之解

体。而这当是中央与河北诸藩交易的结果。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战后双方的实力对比是唐强河北弱。因此我们看到了河北藩镇对于中央政府削减自己的属地颇感无奈，这也反映了广德元年河北藩镇仍是听命于唐中央政府的。仆固怀恩《陈情书》所说的“(河北)赋税以时”，^③也是说明是年河北是上缴赋税给唐朝政府的。尽管广德元年年底，河北藩镇索回了原有的土地，但是此时的他们仍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央对抗。广德二年(764)五月，郭子仪上书以为，昔因安、史占据洛阳，所以才在诸道设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如今叛寇已亡，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请求罢去诸镇节度使。^④在郭子仪看来，过去诸道置军是为了制约叛军，而如今安、史已经亡去，似没有必要再聚兵，言语之间并未视河北为特殊分子。永泰元年(765)三月，独孤及亦上书请求罢兵，其云：“今天下惟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邠、泾、凤翔等兵足当之矣。自此而往，东泊海，南至番禺，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已积岁矣而兵不为之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而为无端之费，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之地，置屯御，余悉休之，以其粮储雇庸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以减国赋之半。陛下岂迟疑于改作，逡巡于旧贯，使大议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⑤依独孤及的上疏来看，似乎当时的河北是安宁的！同时，其也未将河北视为潜在的威胁。两位大臣的奏疏皆未将河北视为特殊分子，似暗示当时的河北确实尚未割据。《太平广记》记载：“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潞阳为镇，命(薛)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彰……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气，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⑥按照《旧唐书·地理二》的记载：“永泰元年六月，昭义节度使薛嵩，请于潞阳复置磁州。”^⑦我们以为所谓的“命嵩固守，控压山东”当在永泰元年六月前后。《太平广记》的记载显示出永泰元年，河北藩镇已经显露出侵吞邻境的野心，而朝廷也将其视为心患，是故才有“命嵩固守，控压山东”的举措。所以《旧唐书·地理一》说：“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⑧所以我们认为河北

藩镇是在永泰之后走上割据之路的。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唐代宗在战后伊始就谋划了一强有力的军事策略欲消灭河北势力于无形之中，这无疑体现了其削藩的决心以及其嗣位之初强硬的藩镇政策。这也使得我们对于代宗末期愈发强硬的藩镇政策^⑨有了一个更为通贯的认识。本来，代宗在初期是准备消灭河北势力的，但是由于随后出现的内忧外患使得其没有精力处理。而大历晚期朝廷在与魏博争夺相卫之际，占领了邢、磁、洺等具有攻略河北意义的州郡，^⑩似说明当时的朝廷已有意攻略河北。通贯而言，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这一政策也为他的儿子德宗所继承。德宗皇帝即位初就有扫平河北之意，即使后来出现了奉天之乱，德宗朝对待河北的政策有所变化，但是其仍不失时机地尽量削弱他们。^⑪元和时期中央更致力于“恢复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⑫可以说，代宗、德宗、宪宗三代对待河北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岑仲勉：《隋唐史》（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3页；王仲华：《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② 王寿南：《论仆固怀恩之叛》，收入黄约瑟主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

③ 黄永年：《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林冠群：《仆固怀恩》，《中国边政》1982年第78卷；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494页；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④ 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4页；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收入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⑤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3《肃宗一〇》；袁英光：《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271页；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492、493-494页；石云涛：《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公元755-763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219页。

⑥ 第一次出兵助国讨逆：《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载：“至德元载七月，肃宗于灵武即位……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肃宗宴赐甚厚。”第二次：《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载：“(乾元元年)八月，回纥使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三千人助国讨逆。”

⑦ 《旧唐书》卷 200 《史朝义传》。

⑧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资治通鉴》卷 222，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7134、7131-7132、7132、7135-7136、7235、7141、7136、7141、7141 页。

⑨⑤③③⑤ 《新唐书》卷 225 上 《逆臣上》。

⑩⑪⑲④④ 《旧唐书》卷 121 《仆固怀恩传》。

⑫ 黄永年先生指出回纥在第三次派兵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乱中并未有特殊贡献，不过其只是讨论官军在河北追逐史朝义的战役，并未提及此次收复洛阳的战役中回纥的行动。兹见氏著《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6-107 页。

⑬⑭ 黄永年：《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7、107 页。

⑭ 《旧唐书》卷 195 《回纥传》。

⑰ 《旧唐书》卷 195 《回纥传》载：“(乾元元年)八月，回纥使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三千人助国讨逆……乾元二年，回纥骨啜特勤等率众从郭子仪与九节度于相州城下战，不利。三月壬子，回纥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

⑰ 《旧唐书》卷 142 《王武俊传》。

⑲ 《新唐书》卷 210 《藩镇魏博》。

⑳㉑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5 页。

㉒ 王寿南：《论仆固怀恩之叛》，载黄约瑟主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 年。

㉓㉔ 《旧唐书》卷 11 《代宗纪》。

㉕ 《旧唐书》卷 142 《李宝臣传》。

㉖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 51 程浩《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相州刺史昭义节度使平阳郡王赠太保薛公神道碑铭并序》，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612 页。

㉗ 王夫之、袁英光、王寿南、彼得森、石云涛指出叛军的内讧对于战争局势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叛军的内讧最终导致安史叛乱的结束。我们以为内讧固然对安史叛军有一定的影响，使叛军内部出现了裂痕，但是当朝廷军队反攻时，再怎么不和谐的军队在遇见同一敌人时，必定会捐弃前嫌。观田承嗣、李宝臣等安禄山旧将准备抵御官军以及其与朝义联合抵抗朝廷军队可略知一二。

㉘ 林伟洲：《河南道军事权力的争夺——安史动乱期间（755-762）的一个区域研究》，《研究与动态》2005 年第 12 期，第 121 页。

㉙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9-212、222 页；林冠群：《仆固怀恩》，《中国边政》1982 年第 78 卷；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52 页；王寿南：

《论仆固怀恩之叛》，载黄约瑟主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3 年。

㉚ 朝廷有实力平定安史叛乱，即是代表仆固怀恩有实力平定安史之乱。仆固怀恩有实力平定安史叛乱才会有树党自固的资本、条件。仆固怀恩若无树党自固的资本、条件，何谈树党自固呢？而持仆固怀恩树党自固论者却又主张叛乱的结束并非因朝廷实力强大所致。既然如此，我们如何相信仆固怀恩树党自固？

㉛ 张国刚虽也否认仆固怀恩树党自固，但是其所据之前提略有不同。其指出：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至新起军阀与宦官势力之矛盾以及唐朝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抗争上。为此，唐廷迫切要求早日结束安史叛乱以至不得不援往日安置安史降将如能元皓、令狐彰之例，授予田承嗣等降将以节度使之职。兹见氏著《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 页。对此，我们不以为然。所谓新起军阀与宦官势力之矛盾，是指仆固怀恩与唐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其以为，正当仆固怀恩血战疆场时，朝廷已“密为之备”，在打他的主意了；仆固怀恩事件是长期以来领兵将帅受到唐朝中央政府以及宦官势力的猜忌、排斥、打击而发生激烈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以为，是仆固怀恩先有贰心，朝廷才密为之备的。

《资治通鉴》卷 222 载：于是邠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由是抱玉、云京疑怀恩有贰心，各表言之，朝廷密为之备；怀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而这种防备仅仅限于心理层面，并未曾过多地涉及军事层面，不然何以后来仆固怀恩叛乱时，代宗要急急地向李抱真询问对策呢？《全唐文》卷 784 穆员《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记载：代宗之初，仆固怀恩怙兵犯顺……上方以怀恩为忧，不啻于禄山、思明之难，遣公（李抱真）进讨。公曰：郭子仪领朔方之众，人多思之。怀恩因人之心，以邀其势，给其众曰：子仪为鱼朝恩所戮。劫而用之。今若复子仪之位，可不战而克。’上嘉而纳之。其后，怀恩父子皆败。”而唐蕃关系的恶化也未曾干扰平叛战争的进行。安史之乱后期，吐蕃的威胁确实很大。但是朝廷并不以此为意。《资治通鉴》卷 222 载：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但是这种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资治通鉴》卷 223 载：吐蕃之初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吐蕃入寇，边将数告急，而程元振都不上奏，似见代宗并不知晓吐蕃入寇。既然朝廷不在意、不清楚吐蕃的入寇，那么吐蕃入寇的情况实无法影响朝廷平定安史叛乱的计划。

㉜ 《旧唐书》卷 132 《李抱玉传》。

㉝ 《旧唐书》卷 134 《马燧传》。

④⑤ 《旧唐书》卷 134 《马燧传》载：是时，怀恩遣薛嵩自相、卫贽粮以绝河津。抱玉令燧诣薛嵩说之，嵩乃绝怀恩从顺。”

④⑥ 《全唐文》卷 444，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

④⑧ 详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2 页。

④⑨④ 《资治通鉴》卷 223，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7161、7165 页。

⑤⑩ 冀州、瀛州在广德元年曾转属于多个藩镇，诸书相关记载颇为纷乱，亦有错误之处，兹详辩之。《资治通鉴》卷 222 载：沧、冀、瀛三州归淄青管。《新唐书》卷 66 《方镇三》载：广德元年，冀州由幽州转属成德。我们知道冀州原为幽州所管，广德元年后，则一直由成德管辖。据此，我们以为冀州当是在广德元年五月先由幽州转属淄青，然后再于是年年末由淄青转属成德。《资治通鉴》卷 222 代宗广德元年正月载：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999 年末刊博士学位论文，第 106 页）指出：《资治通鉴》卷 222 所记载的魏博等州防御使领有魏、博、沧、德、瀛五州乃是是年最后定制之说。但是他却推出始置魏博等州防御使时显然并不领有瀛州。在其看来，广德元年，瀛州先是由幽州转属淄青，再由淄青转隶魏博。我们以为赖氏所云有误。《全唐文》卷 444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载：特迁（田承嗣）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旧唐书·田承嗣传》、《新唐书·方镇三》皆如是记载。《新唐书》卷 65 《方镇二》载：广德元年，淄青平卢节度增领瀛州；未几，瀛州复隶魏博节度。由“复”字可知瀛州原隶魏博。据此，我们以为始置魏博等州防御使是领有瀛州的。故在我们看来，瀛州先于是于广德元年初由幽州析出置魏博，然后于是年五月转隶淄青，再于该年末复归魏博。

⑤①⑤② 《新唐书》卷 66 《方镇三》。

⑤② 《新唐书》卷 66 《方镇三》指出：广德元年，卫州复隶泽潞。我们以为“复”乃衍字。详见拙稿《唐代后期泽潞镇军事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3 期。

⑤④ 陈寅恪、樊文礼、王赛时等先生指出淄青一镇自李正己袭夺淄青军府之位后，遂与河朔同风，成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此见广德时淄青仍听命于中央政府。因为李正己袭夺淄青军府之位是在永泰元年。因此我们以为沧、瀛、冀三州转隶淄青，即是表明当时朝廷控制此三州。需要澄清的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央已经不能控制河北，当时的河北已经割据。在我们看来，朝廷之所以欲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削弱、限制河北的实力，是出于河北与仆固怀恩的特殊关系所致是为了阻止河北与仆固怀恩勾结的可能性的发生。而朝廷只能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当时中央已没有平叛刚结束

时的绝对实力，而河北也并非一点实力也没有。因为叛将刚分帅河北之时，他们的实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削弱。陈先生等人的说法详见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37 页；樊文礼《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 年第 2 期；王赛时《唐代淄青镇》，《东岳论丛》1994 年第 2 期。当然，他们的说法亦不完全正确。《旧唐书》卷 155 《穆宁传》载：大历四年，起授（穆宁）监察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淄青。”大历四年，中央仍能在淄青设置转运使，说明迟至大历四年，淄青仍上缴赋税给朝廷。也就是说那时淄青仍听命于中央政府。

⑤⑤ 《读史方輿纪要》卷 13 《北直四·沧州》。

⑤⑥ 《读史方輿纪要》卷 13 《北直四·景州》。

⑤⑦ 《读史方輿纪要》卷 31 《山东二·德州》。

⑤⑧ 《读史方輿纪要》卷 13 《北直四·河间府》。

⑤⑨ 《读史方輿纪要》卷 49 《河南四·卫辉府》。

⑥⑦⑦ 详见拙稿《唐代后期泽潞镇军事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3 期。

⑥① 《全唐文》卷 444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记载：及（怀恩）恃功不虔，造节方兆，虎据汾晋，寇于太原，乃分使河朔，连扇群帅，邀我同恶，示以师期。”《旧唐书》卷 134 《马燧传》记载：无何，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其帅辛云京觉之，斩竭诚，固城自守，怀恩遣其子瑒率兵围之……是时，怀恩遣薛嵩自相、卫贽粮以绝河津。抱玉令燧诣薛嵩说之，嵩乃绝怀恩从顺。”二书皆认为怀恩谋求河北响应的时，是在攻打太原前后。但是有关怀恩攻打太原的时间，诸书记载颇异。根据吕思勉先生的研究，其攻打太原的时间是在广德元年十二月，即以《旧唐书·代宗本纪》为是。兹可参阅氏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1 页。

⑥③ 《全唐文》卷 432，仆固怀恩：《陈情书》。

⑥⑤ 独孤及：《毘陵集》卷 4 《谏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28 页。

⑥⑥ 《太平广记》卷 195 《红线》。

⑥⑦ 《旧唐书》卷 40 《地理二》。

⑥⑧ 《旧唐书》卷 39 《地理一》。

⑥⑨ 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与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

⑦① 刘玉峰：《唐德宗评传》，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61 页。

⑦②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4 页。

作者简介：陈翔，男，1980 年生，福建南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张卫东）